

淮海战役：我军何以步步占先

■王晓强 田恩军

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等部队，对国民党长江以北主力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敲响蒋家王朝的丧钟。淮海战役的胜利，闪耀着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体现了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彰显了人民军队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高度团结歼敌主力。淮海战役既是战略决战，也是政治较量。我党我军的政治进步性，使我方可以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作战方针，在广大地域内灵活调度华野、中野和晋中、苏北军区等数十万兵力，使各种力量向心凝聚，形成坚强的战斗整体，协调一致打击敌人。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野战军与地方部队之间团结一致、密切协同，在战略上游游刃有余地钳击任何一点的敌人，在战役战斗中直接配合、彼此呼应。尤其是在围歼黄维兵团的双堆集歼灭战中，中野在敌我兵力相当、武器装备明显处于劣势情况下，毅然决然拿出“破釜沉舟”的气魄。邓小平同志在动员时讲道：“即使这一仗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各纵队作战中经过3至4次火线编组，哪怕一个旅编成一个营，也要为全歼黄维兵团战斗到底。为确保前线作战胜利，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党政军民全力支援，支前群众提出“倾家荡产，支援前线”的口号，前方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正如中央战报嘉奖电所说，“凡此巨大战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与战士、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

我党政军民密切协同所形成的高效作战威力，敌人根本无法企及。尽管国民党军拥有80万人、总兵力超过我军，还拥有坦克、飞机、大炮等优势装备，但政治上反动引发了组织上严重涣散，正如美国陆军组织撰写的《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作战艺术》一书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军队最大的问题是长期的派系之争。淮海战役中，不仅有蒋系与桂系、蒋系与西北军等派系矛盾，嫡系兵团内部也存在黄百韬与邱清泉、黄维与胡琏、邱清泉与李弥等个人恩怨，各种勾心斗角、拆台掣肘，战场上内讧演



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位总前委在淮海战役期间唯一一张合影

愈烈，即使身处解放军围困之下，还时常为争夺空投给养大打出手。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国民党军自始至终无法形成合力，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最终优势丧失、走向失败。

主动运筹擘画战局。淮海战役是典型的大兵团战略决战，是双方指挥员纵横捭阖的战略较量。敌我双方参战兵力达到140万人，我军面对的是国民党5个兵团、4个绥靖区、34个军的兵力，战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自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指挥决策和战场调度难度呈倍数增长。我军之所以能以60万兵力击败80万敌人，并获得歼敌55.5万余人、敌我损失比例4.1:1的精彩战绩，靠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指导和前线指挥员的精妙运筹。

纵观淮海战役全程，我军始终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在不同阶段形成对各路敌军的局部优势。

战役第一阶段，华野抓住敌黄百韬兵团南撤迟缓的战机，集中12个纵队及特种兵部队优势兵力，以3个纵队阻击敌第13兵团增援，以3个纵队自徐州以北逼进徐州、切断陇海铁路，以7个纵队包围敌黄百韬兵团，歼敌和打援兵力分配接近1:1，硬是把黄百韬兵团从敌人完整的防御体系中分割出来、包围歼灭。

战役第二阶段，中野抓住黄维兵团

远道而来、孤军深入的特点，改变我军以往“先打弱敌”的习惯，集中中野全部兵力和华野3个纵队之力，围歼这支战斗力最强的敌军精锐。蒋介石心腹黄维兵团，强令杜聿明率3个兵团前往救援，结果又被华野主力包围在陈官庄。从决战开始到合围形成，我军的集中用兵战术和敌军的添油战术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军指挥混乱、进退昏招，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被分段分片使用，分批次投入不同方向战场，结果反而被我军逐次包围、各个击破。战场上，始终呈现着“我军步步为先、敌军招招落后”的局面。

灵活战法创造优势。淮海战役是敌我主力在平原地区展开的正面决战，是对我军战役战术的一次大考。国民党军背靠京沪腹地，火力优势明显，交通便利，陆空支援力量雄厚，我军火力、机动性不占优势，打阵地战、攻坚战非常吃力，反客为主难度很大。在各条战线上，我军根据敌我态势及情况的变化，适时转换和正确运用作战样式，把大规模运动战和大规模阵地战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因势制宜，从而有效发挥我军土工作业和近战战术优势，避免与敌人硬拼消耗，保证战役各阶段作战的胜利。

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华野面对在碾庄20多个村庄固守的敌人，穿插运用“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术原则，与敌人比耐性、比

韧性，一点一点消耗、吞食敌人，最终取得自身伤亡小、歼敌数量多的理想战绩。在中野围歼黄维兵团过程中，针对敌人顽固固守和我军炮火不足特点，我军“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对敌展开工程浩大的逼近作业，把交通壕逐步延伸到敌前沿阵地，甚至进入敌第一道战壕内，构成完整进攻阵地，减少我军在开阔地冲锋时的伤亡。同时，普遍推广中野11旅和22旅在战前研制成功的炸药抛掷筒，弥补我军炮火不足的弱点。总攻时，各纵队集中优势兵力，实行有重点、多方向的连续突击，猛烈杀伤和压缩敌人，全歼守敌。刘伯承司令员总结指出，“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

英勇顽强压垮顽敌。淮海战役是敌我两军展开的一场血战，也是我军走向胜利的战争精神洗礼。人民解放军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付出牺牲3.1万余人、伤13.6万人的巨大代价，把垂死挣扎之敌困死、歼灭在包围圈里。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我军阻击阵地遭敌飞机、火炮、坦克和步兵的立体进攻，但我军阻击阵地依旧岿然不动，敌援军眼睁睁地看着黄百韬兵团走向覆灭。在总攻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各部队虽连续战斗伤亡较大，但士气愈战愈高，战斗力愈战愈强。许多部队的连排干部伤亡后，由班长、战士，甚至司号员、卫生员自动代理。有的班只剩下一个战士就主动加入别的班继续战斗，有的一个连编成一个排，仍坚持完成任务。中野76团3连在战斗中边打边重新编组，最后只剩下指导员和9班长等17名负责同志，仍然编成两个突击队，攻下敌军最后一个地堡群，中野6纵“襄阳营”1连3排战后就只剩下3名战士，真正做到“一切为了胜利，一切唯有胜利”。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同江市人武部)



2013年的“戴猫行动”是对法军指挥体制的一次检验

大国军队总参谋部源起之六：法国军队参谋部

■韩晓军 林陈彬

拿破仑首创参谋处

1796年至1815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先后远征意大利、埃及和叙利亚，又与“反法联盟”之间爆发“拿破仑战争”。这些战争规模空前，参战的不仅有步兵、骑兵等传统兵种，还有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兵等新兴兵种，师和军逐渐成为法军固定编制单位。拿破仑深感指挥庞大军队进行诸兵种协同作战极为吃力，便成立参谋处协助其进行指挥。

1801年，拿破仑任命贝蒂埃组建法军参谋处，参谋处共设4个科：第1科主管编制和兵力人数；第2科主管部队装备、炮兵、工兵以及给养、医院等；第3科主管侦察、情报、作战计划、通信、向导、军邮等；第4科主管内部勤务，为行政管理部。该参谋处机构设置齐全，分工明确，基本具备现代参谋部的组织框架。

不过，受历史条件所限，当时法军指挥权仍高度集中于拿破仑本人，法军参谋处功能发挥极其有限。后人认为，拿破仑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根据战争实际需要有效利用参谋处。

戴高乐成立三军总参谋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虽然自由法国武装力量收复本土，但其指挥层战略眼光严重滞后和指挥关系混乱不清等问题凸显。二战后，时任法国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布尔指出：“1914年，法军总参谋部做好了应付1870年战争的准备；而在1940年，他们做好了应付1914年战争的准备。”针对法军领导指挥体制的军事改革势在必行。

1958年，戴高乐政府修订新宪法，并根据新宪法于1959年制定《国防组织法》，此法被认为是法军现行国防体制的基础。《国防组织法》对参谋机构作出重大调整，撤销原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成立三军总参谋部。三军总参谋部被明确为法军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平时负责制订部队建设和作战计划，战时全权负责指挥法军所有军事行动。自此，法国总统可以通过国防部和三军总参谋部分别对全军实施行政领导和军事指挥。1982年2月，法国出台国防法，再次明确三军总参谋长可直接指挥法军陆海空三军，各军种参谋长任副总参谋长，负责协助支持三军总参谋长决策，但没有实际指挥权。

尽管上述规定十分具体，但在实际军事活动特别是危机发生时，军种参谋长因拥有部队实际控制权，即便接受三军总参谋长的指挥，也往往会与三军总参谋长和三军总参谋部讨价还价，致使三军总参谋部有名而无实，功能作用发挥极其有限。

提升总参谋部地位权力

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的爆发，使法军对未来作战和指挥的看法发生转变。为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变化、捍卫国家利益，法国在时任总理、主张改革的巴拉迪尔主持下，于1994年2月颁布

他策划集中营最大越狱，却久不为人知

■立军



俄罗斯电影《索比堡》海报



亚历山大·彼切爾斯基



电影《逃离索比堡》剧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建立多座死亡集中营，虐杀大批犹太人和俘虏，死亡集中营的囚徒也组织过规模不等的暴动和越狱活动。2018年，俄罗斯拍摄了一部名为《索比堡》的电影，讲述的就是二战规模最大的越狱行动——1943年10月14日发生在波兰索比堡死亡集中营的越狱事件。

历史学家统计，当时索比堡死亡集中营共拘押550人，130人未参加行动，其余参与越狱的人员中有80人丧生，170人被抓获枪毙，90人被波兰人出卖，战争结束时，幸存越狱者仅53人。行动中，越狱者杀死12名党卫军看守和38名乌克兰卫兵。气急败坏的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下令杀害越狱者并将集中营夷为平地。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人们才得知这次越狱行动的领导者是苏联军官亚历山大·彼切爾斯基。

当时，为逃离死亡，索比堡集中营的囚徒秘密成立越狱小组，但一直没有制订具体行动计划，时间又不容拖延，因为党卫军每天都会分批毒杀囚徒。随新一批囚徒来到集中营的苏联军官亚历山大·彼切爾斯基，改变了这一状况。行动小组成员经过认真甄别和考察，认为他性格坚毅，选他领导整个越狱行动。

彼切爾斯基毕业于罗斯托夫国立大学，卫国战争爆发第一天即参军入伍，先后参加多次大规模战役，后来在莫斯科以西的维亚兹马地区陷入重围受伤被俘。1942年5月，彼切爾斯基第一次尝试逃跑未果，后被送往鲍里索夫惩罚营和明斯克惩罚营关押。因在一次体检时被发现是犹太人，彼切爾斯基被押解到明斯克犹太人区，后于1943年9月押送到波兰索比堡死亡集中营。

在彼切爾斯基的领导下，越狱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10月14日，即彼切爾斯基到集中营3个星期后，越狱行动开始。幸存越狱者谢苗·罗津费尔后来回忆：“囚徒们同时杀死几个德国军官后，便扑向警卫室砍铁丝网（这里的铁网防护网只有一排，未通高压电）。尽管哨兵从瞭望塔上开枪射击，

集中营周围还设有雷场，但许多人成功逃进树林。”

逃出集中营后，彼切爾斯基和其他8名越狱者在树林里躲藏一阵后，投奔白俄罗斯晓尔斯游击队。彼切爾斯基担任爆破手，成功使两列德国列车脱轨。在与红军正规军会合后，彼切爾斯基因曾被德军俘虏而遭逮捕，后来因政策变化获释加入第1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第15突击营，并因作战英勇，后来获授大尉军衔。

《共青团真理报》1944年秋天曾刊登文章讲述索比堡集中营越狱一事，甚至还提到组织者是一个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出生、名叫沙什科的苏联军官，但此后再无相关报道。彼切爾斯基的孙女拉德琴科后来对《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透露说，她祖父终生都想让全世界知晓索比堡集中营发生的一切，还写了一本有关此次越狱行动的专著，但由于当时苏联的国内外形势，这本书没有出版发行。彼切爾斯基前往纽伦堡国际法庭作证的申请也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允许。后来，彼切爾斯基曾试图寻求苏联电影界的帮助，拍摄一部关于索比堡越狱的电影，但遭到拒绝。1987年，英国和南斯拉夫合拍改编自索比堡越狱事件的电影《逃离索比堡》，获得了第45届“金球奖”。

1990年1月19日，彼切爾斯基与世长辞。2007年，顿河畔罗斯托夫市政府在彼切爾斯基故居前，为他设置一块纪念碑，2015年该市有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2016年1月，普京总统颁令追授彼切爾斯基“勇敢”勋章。2018年，《索比堡》在俄罗斯上映时，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为彼切爾斯基立起一尊雕像，树立在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学内。



拿破仑首创法国军队参谋处